

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口语语体翻译研究

任 莹

(华北理工大学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 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而翻译通过文字符号的相互转换进行跨文化交际,进行信息传递并服务于社会,口语语体的翻译则更加注重其社会应用和跨文化交际的价值,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研究语言的社会现象的学科,将语言置于社会环境中去研究,将口语语体的翻译同社会语言学的结合,将为翻译研究提供新方向,更突出其实际价值。而语言的交际性和社会性则显现出翻译同社会语言学相结合的必要性。本文着重研究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口语语体翻译,分析口语语体翻译的民族文化差异性以及语言使用者与口语语体的翻译。

[关键词] 社会语言学;口语语体;翻译研究

一、引言

社会语言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和社会关系,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语言结构,语言在交际中的作用。库尔马斯认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人们说话的方式,语言如何变体以及社会属性(如:社会阶级,性别,年龄等)和语言使用形式的相关性[1]。社会语言学关注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关注语言的交际,而口语语体则更加注重语言在社会环境下的使用。

口语语体与书面语体相对应,是通过适应口语和使用全民语言形成的一种言语形式。口语语体由于其使用者的多变性,使用环境的复杂性与会话状态的即时性,具有灵活多变的特征。而对于口语语体的分类,对于译者来说,更需要根据其灵活性的特点进行灵活翻译,以达到准确传达信息的目的,避免引起歧义或误解。

此外,关于翻译同社会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便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从德国翻译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家汉斯·威密尔提出的翻译目的论中提倡的翻译目的原则可以看出,翻译需要考虑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在译入语的情景和文化中,应该满足译入语接受者期望的方式进行翻译[2]。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工具,其社会性和文化差异性不可避免,将社会语言学纳入翻译中去考虑能够为翻译提供更好的方向,从而避免因社会文化引起翻译误差。

有关翻译同社会语言学相结合的著作有:莫里斯·贝尔尼埃的《翻译的社会语言学基础》率先将社会语言学引入到翻译中,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方向,让·皮尔特的《异的介入—翻译的一种社会语言观》中强调翻译活动中人的社会能力[3],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得以提高,什维策尔的《翻译与语言学》中提出了三个社会语言学同翻译的交叉,奈达的《跨语际交际的社会语言学》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同翻译相结合,系统地总结了社会语言学翻译观[4]。此外,中国对于翻译同社会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也得到重视,部分学者发表的文章得到广泛认可,如蔡毅的“翻译的社会语言学基础”,“翻译理论与社会语言学”表明翻译是一种社会现象,受环境制约并服务于社会[5],俞佳乐的“翻译的社会语言观”表明社会语言学为翻译提供理论与方法的支持,蒲公英的“透过社会语言学看翻译变异现象”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解释翻译的变异[6],朱达秋的“语言的社会变体与翻译”在翻译时从语言的社会变体角度正确处理语言和言语行为等[7]。

前人对于翻译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方向,但是对于口语语体的翻译同社会语言学的结合的研究仍不多,本文将从社会语言学和口语语体翻译结合进行探究。

二、口语语体翻译的民族文化差异性

对于不同国家对于同一句话的理解是不同的,这就需要译者考虑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以免造成因误译而引起的矛盾或误解。

中西文化差异会引起翻译的变化。如,在中国对某些人年长

的人或资历高的人表示尊敬常称其为:您老,张老等,而在西方文化中的与“老”相对应的“old”则常常带有贬义,所以对于这类称呼的翻译,应“入乡随俗”,既要表达出尊敬之感,又要避免因文化差异造成误解而产生不快。

在中国,我们碰到熟人或朋友时常问:“你吃了吗?”一般情况下,这句话的说话人含义并非想真正得知听话人是否吃过饭了,而多是表达一种碰面时的问候,这时将其翻译为:Have you eaten?则没有注意到中西民族的文化差异,从而导致听话人不能真正明白说话人的意图,对于听话人来说则容易产生歧义,所以针对这句话用于人际交往来说翻译为:How are you?则更能够让听话人了解说话人的意图,避免因文化差异造成误解,也能够更清楚地将说话人问候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能够正确地传递说话人所提供的信息,这种翻译方法虽未达到等值翻译或对等翻译的要求,但能够更好的传达信息,帮助说话双方进行交际活动,这也是翻译目的论中适切性的要求,所谓适切性就是说等值的符号转换不是必须条件,应更注重译文要完成在其译语情景和文化中的交际功能,译者可以根据不同国家语言文化的差异,对翻译适时作出调整,从而将推动交际更好地进行,减少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种种误会,而使交际行为和交际活动产生搁浅[8],这就对译者来说增加了翻译的复杂性和翻译难度,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不仅仅需要语言符号的转换,在口语语体交际中更需要充分了解各国语言文化差异,打破文化差异藩篱,进而提高翻译质量,更好地进行语言交际。

三、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属性与口语语体翻译

(一) 语言使用者的社会阶级

在社会语言学视角下,人类语言的使用会因社会阶级的不同发生语言变体,如拉波夫在纽约所做的调查关于元音前辅音[r]的发音问题,不同的社会阶级的发音方式是不同的,拉波夫在分别纽约的三家百货大楼进行调查,这三家百货大楼分别为Saks, Macy's, S.Klein,通过对商场位置,广告和商品价格方面的区分,将三个商场分别代表三个社会阶级群体:高层,中层和低层,通过调查拉波夫发现高层社会发[r]音人数比例大于低层,如图1。即社会地位越高,往往更容易发[r]音,因为他们认为其更接近标准英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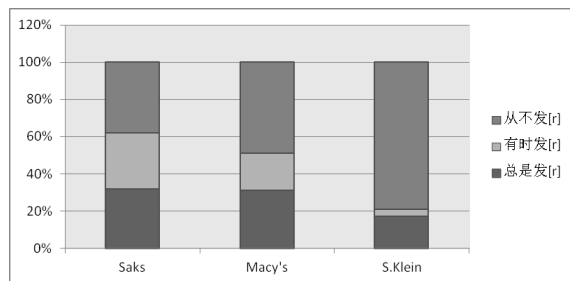


图1 纽约三家百货大楼-r音使用比率(来源 Labov 1972, p.51)^[1]而对于口语翻译中,翻译有关社会阶层较低的群体的口语,

也应对其社会地位有所体现,尤其是关于发音不标准且身份地位较低的黑人群体的口语翻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黑人英语的翻译在保留能体现其社会地位的发音特色外,也应避免翻译过于晦涩或因过于追求贴合黑人英语的不标准性使译文难以理解。

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对于黑人英语的翻译,译者考虑到黑人英语的特殊性及其社会地位的复杂性,成时保留了黑人英语中语法,语音不标准的特点,如:“I wouldn't want no mo.”成时将其译为:“再陀(多)我也布约(不要)。”[9]通过谐音保留了黑人英语发音的不标准的特点,此外,也体现了人物的社会地位,在不影响译文可读性的同时,保留其发音语法特点,从社会语言学角度体现其社会属性,在文学作品的口语对话中,其社会属性和特点有时更为明显,译者需要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展现文中说话人的特点。

(二) 语言使用者的性别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社会语言学开始有关于性别的研究,性别差异也会导致语言使用的差异。社会语言学中的性别差异是指男性和女性在社会、文化以及心理因素上的差别,是关于社会建构的问题[10]。由于历史上部分国家男尊女卑的现象明显,女性处于社会的从属地位,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加注意语气,多使用委婉的语言,而男性则说话更加直接,从而男女性别差异也会导致语言的变体。

对于男女用语的翻译也应根据性别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在日语翻译中尤为明显,比如:“我不明白呀。”这句话不同的性别翻译成日语也会有差异,通常,女性常表达为:わからないわ。而男性表达为:わからないよ。

此外译者的性别差异也会对翻译造成影响,哈伍德曾表示她在翻译男性作家的作品时,由于男女认知的差异,很难通过男性使用的词汇去翻译,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也不能做到等值翻译,从而使翻译失去了原文的表达效果。对于男女译者的性别差异在翻译实践中的体现中,杨文慧曾做过关于译者性别和翻译语用差异对比实验,《简爱》中:“Do we pay no money? Do they keep us for nothing?”,对于这句话的翻译,男生译为:“我们不用付钱吗?他们让我们白吃白住吗?(真不可思议)。”女生则译为:“我们不用给钱吗?他们让我们住这(栋别墅)里,却什么都不要呀。”[11]从这组对比翻译中可以看出,男生使用了“白吃白住”,语句较短并且语气生硬,而女生的语气比较轻柔,句子也相对较长。

所以在翻译中,译者也应尽量避免因与原文作者的性别差异而影响翻译质量,脱离原作者的思想与语境效果,应尽量做到性别语言转换,实现翻译等效性。此外在文学作品的口语体翻译中也应注意考虑到人物的性别,进行区分翻译。

(三) 语言使用者的职业特征

对于语言使用者的职业特征主要涉及到行话的翻译,行话是按照社会的行业区别而命名的,职业的不同所对应的行话也会有差别,比如医生,律师行业的部分语言涉及到行话的翻译,对于

行话的翻译应在保留其专门职业特征的同时,对于一些难以理解的词汇和语句加以注解,使译入语更能为读者所理解。例如,在法律翻译中,一些用语的并非是日常生活中的含义,有时只有律师才明白其在法律中的意思,如execution一词在普通英语中一般译为“执行”,而在法律翻译中是“签订”的含义。

所以说行话的翻译对于译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译者需要了解说话人的职业,并熟悉了解该职业中行话的翻译,避免因不了解该行业的行话造成误译,这种情况下的误译有时会对说话人以及译入语的听话人造成较严重的影响。

四、结语

将翻译置于社会语言学中去分析,将翻译视为一种社会行为,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考虑需要翻译的说话人的身份及社会属性,同时也需要考虑译者的社会属性,从而使翻译达到最佳等效匹配,这对译者的翻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口语语体本身具有社会交际性,对于口语语体的翻译更应将社会语言学纳入其中,但是,译者不能局限于说话人的社会属性,也要考虑说话人的性格特征,说话语境等来选择最佳翻译方式,使译文尽量贴近原文所表达的内容和思想,脱离作品的口语交际中,译者应以传达信息为主,尽量避免错译或因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导致交流不畅的情况发生。

参考文献

- [1] Ronald, W.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2]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3] 俞佳乐. 翻译的社会语言学观[J]. 中国翻译, 2000(06): 41-45.
- [4] Nida, E. A.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M]. Hohhot: Inner-Mongoli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5] 蔡毅. 翻译理论与社会语言学[J]. 中国俄语教学, 1995(04): 41-43.
- [6] 蒲公英. 透过社会语言学看翻译变异现象[J]. 外国语, 2013, 29(S1): 139-142.
- [7] 朱达秋. 语言的社会变体与翻译[J]. 外语学刊, 2001(04): 85-88.
- [8] Downes, W. Language and Society[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9] 李晓云. 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美国黑人英语的翻译——成时和许汝社中译本之比较[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7(03): 99-100.
- [10] 张廷国, 郝树壮. 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1] 杨文慧. 翻译实践中的性别定位[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7(01): 41-44.